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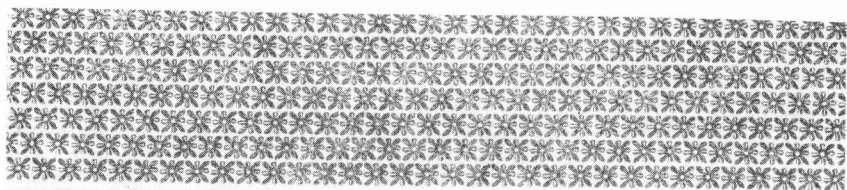
第十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重慶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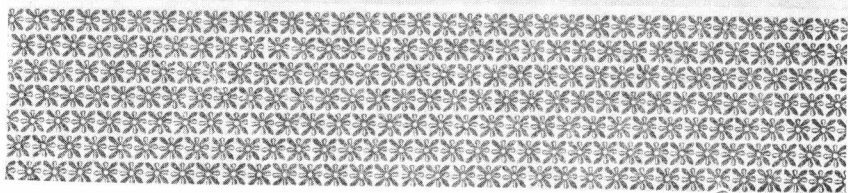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裴知先生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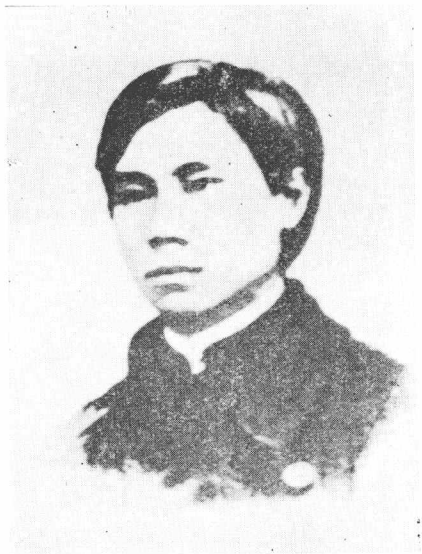
高瞻遠矚

孫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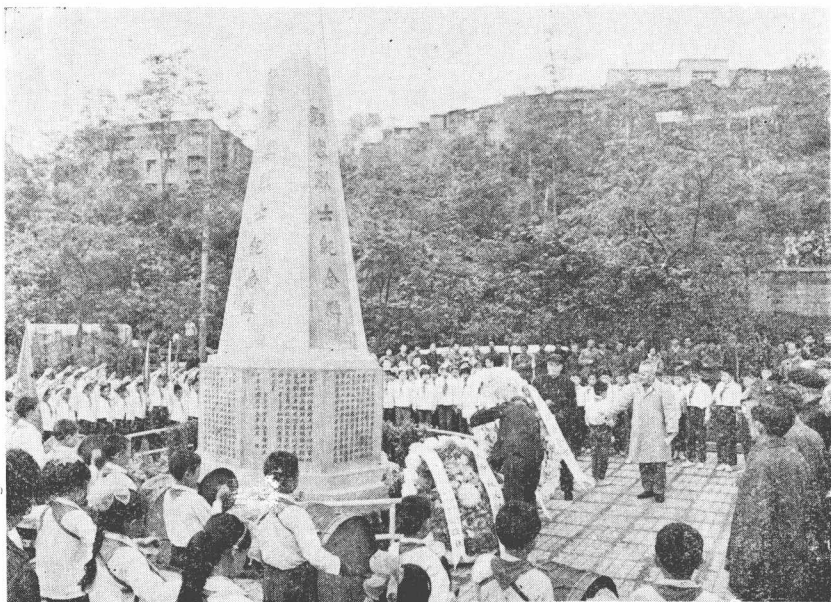
孙中山先生书赠李裴知先生条幅

邹容烈士



重庆市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举行邹容烈士纪念碑修复落成仪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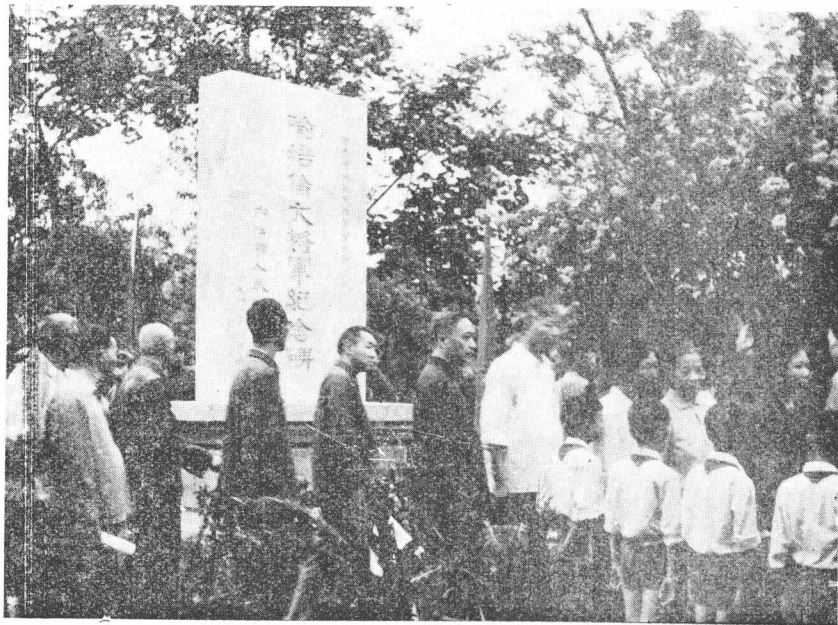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一年十月九日)



喻培伦烈士



内江地、市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瞻仰喻培伦烈士纪念碑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彭家珍烈士

成都市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界
人士瞻仰彭家珍烈士纪念
碑

(一九八一年十月八日)



目 录

辛亥革命前四川历次起义

亲历记熊克武遗作(1)

先父赵尧生在辛亥革命前后的

政治活动赵念君(32)

赵尧生事迹补遗曾 进(38)

李耀庭父子与辛亥革命程仲澄(44)

章太炎先生在重庆李润苍(49)

邹容的少年时代张孟虚(67)

喻培伦生平王东伟(85)

彭家珍传略徐南洲 张诚毅(136)

同盟会与四川会党隗藏涛 何一民(171)

补充·订正·质疑

对《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的几点

订正和补充周 勇(194)

对《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的订正……何宏钧(196)

辛亥革命前四川历次起义亲历记

熊克武遗作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哥熊克武因病住北京医院，我专程前往探望。他向我口述了辛亥革命前几次革命起义活动的亲身经历，要我代为整理成文，并经其过目。本文尽量根据其原话落笔，如时间纪年、地方名称，虽现在已有改变，但仍维其旧，以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特录出此文，用作文史资料，以志不忘革命事业的艰难和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

熊达成谨识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参加革命的经过

我家世居井研县盐井湾（今研经镇），弟兄八人，我行第二。父亲熊治平业中医，以家中人口众多，生计亦颇艰难。父亲原拟命我习中药业，我认为“医人”和“医国”都是仁术，不过当时正是辛丑卖国条约签订之后（1901年），国势日蹙，有被列强瓜分之虑，一般爱国知识分子都忧心忡忡，大家盛传一首诗：“伤心又是榆关路，处处风翻五色旗。”（这里指英、法、德、意、日等帝国主义旗帜）我不愿习医药而愿从戎报国。其时我先后就读于井研县钵儿山和荣县方家冲但氏私塾。教师吴蜀等老先生对我

启发最大。他经常给学生讲宋末、明初的历史，要学生抄写有关反抗元、清的文献，如：《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我特别喜欢夏完淳的诗文，这些不仅使我获得了不少关于反抗异族



熊克武、熊达成合影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五日摄于
北京交道口南三条十六号熊寓)

历史知识，也启迪了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吴老师常从省外亲友处得到《革命军》、《时务报》，我看后更感到清廷的颓废腐败，民族的危机紧迫。同时受到当时轰动四川的余栋臣、廖观音等打教堂案件的影响，更加增添了民族义愤和爱国热情，故向往于革命的实际行动，愿意献身于革命事业。

一九〇二年，清廷停止科举，兴办洋学，在成都设立了高等学堂和东文学堂，此外还办了东游预备学堂，前者由各县选调秀才入学，毕业后即以官费送日本留学，后者则系自费生。我于癸卯（1903年）春入东游预备学堂，是年冬即东渡日本，肄业东京大成中学，后又入东斌军事学校。我的学费由叔父熊治宜供给，当时叔父经营缫丝业，每年盈利数百两银子，足够接应。

到东京后，接触爱国志士日多，又能看到进步书报，对革命道理也更加领悟，就更自觉的倾向于革命了。但革命工作应该做什么？怎样做？还是很茫然。后来听同乡鄢奉先说他们岩仓铁道

学校暑假补习班的翻译程家桢先生下课时在黑板上写着：孙逸仙先生到了东京。我们听了这个消息非常兴奋，我同但懋辛立即去程家桢家打听孙先生的住址。刚好孙先生在程的家里，我们如愿以偿，第一次会见了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家。一九〇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的下午是一次难忘的会晤，它决定了我一生奋斗的道路。当时的谈话是这样的：

孙：“熊、但二君在此学什么？”

熊：“学陆军。”

孙：“为什么学军事？学来何用？”

熊、但：“为富国强兵计耳！”

孙：“当前国弱勢危，实非仅军事不如列强，根子在于清廷腐败。如等学成报国，不仅报国无门，恐怕也来不及了！”

熊：“然则，何以为计？”

孙：“必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熊：“谨受教，愿力行之！”

从此以后，我就填写了誓约，决心参加革命活动。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三日我们在东京富士见楼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欢迎孙先生，他作了一个精辟的、富有鼓动性的演说，使人们更加明白改良主义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只有民主革命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同盟会正式成立，我被选任为总部评议部评议员。当时四川人入盟者数十人，选任机要任务的有：总部评议部评议员熊克武、但懋辛，执行部书记李肇甫，四川分会会长黄树中。一部分同志拟定章程，我则搞组织工作。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出版后，孙先生在原来发刊词里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三民主义的主张。这样，同盟会就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革命纲领和主张，比以前简单的反满复汉思想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这时我深深地感到，革命事业不是自发的，而是第一来源于社会的需要（即所谓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其次是靠领袖人物和革命理论的启发和感召；其三是革命者自己的觉悟、决心和勇气。

同盟会成立后不久，中山先生去到横滨，来信要总部派人去横滨跟梁慕先学制炸弹。我同黄树中、曾冠自愿接受这个任务。梁慕先教我们用王水煮化墨西哥银元制成炸药，其爆炸力极猛，容易出危险，但我们都乐意学习，因为当时炸弹和手枪是威力较大而又便于携带的武器，对革命工作十分有利。在横滨期间我们和中山先生往来最密，受他的启发和教诲也最深。我们每次去看中山先生，他总是在看书、写作或是会客，还亲自操作家务，他一边洗东西，一边和我们谈话；吃饭就在附近小料理店解决，每天总是工作到深夜。他这种学习精神、俭朴作风、艰苦生活，使我们深为感动。先生常为我们讲述革命行动的方针和策略，再三教导我们：“革命是一定要成功的，我辈应该有这种坚强的信心，又要有不怕失败，百折不挠的勇气；还必须要有舍生取义，成功不必在我的精神。”这些都是我终身难忘的训示，也是我数十年来要求自己的行动准则。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愤怒，展开了反对“取缔规则”的运动。各校代表开会讨论对策，决定全体罢课，以示抗议。至于罢课后日本政府不理又如何对待？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在全体罢课之后，继之以全体退学；另一种则认为全体罢学回国，不在日本受辱。我是赞成后一种主张的。但实际行动起来，困难很多，一万多留学生回国，船只问题、路费问题都难解决。我当时急于实行革命行动，毅然回国，同行的有秋瑾同志，川人则有黄树中和谢奉琦同志等。这次回国学生中自费生多，官费生较少，因为清廷对留日学生采取了威迫利诱兼施的办法来分化学生，一方面缉拿革命党，一方面用官爵来引诱他们，曹汝霖、章宗祥就是这批上钩失节的人。

我们回到上海的同学决定自己办学为中华民族争口气，同时又可利用学堂作掩护，作为国内外联络的交通站，进行革命工作。于是约集了七十三个同学（多数是同盟会成员）集资办学，四川的孙镜清捐了约三千元，其余同学也各捐助一些，至少二十元。就在上海北四川路新靶子路租了一所房屋，并选张定杰、黄兆祥、姚宏业、孙镜清、王团沙等负责筹办。但因捐款数目微小，学校难以持久，姚宏业为此愤而投黄浦江，以死呼吁，激发了不少人捐输。后来经同志们努力经营，终成为有名的吴淞中国公学。对于革命工作也确实起到了一个联络站应有的作用。

我在上海时，东京同盟会总部委任我和但懋辛负责日本、上海和内地同志的联络和接头工作。如一九〇六年春我和但懋辛奉派迎接章太炎出狱。我们问章：“你准备如何出处？”章说：“中山在哪里，我就去哪里。”我们安排他到日本会晤中山先生。同年五月，中山先生化名高野，乘法国邮船由日本经上海去南洋，我和但懋辛组织了暗中保卫的工作，并上船去向他汇报了内地革命工作的情况。临走时，中山先生说尚需要一千元钱，我们立即设法筹足，交由秋瑾同志送去。一九〇六年七月，同盟会总部又派我和龚铁铮（湖南人）去调查新军和警察冲突的案件，目的是利用他们内部的矛盾，乘机拉拢新军，任务完毕返沪。东京总部派董庆伯带来命令，派我和谢奉琦、黄树中为川省主盟人，我即离沪返川。

二、在四川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我回川时，同盟会总部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散处各地的同志联络起来，并建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力量和核心骨干。然后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因为孙中山当时指示：“扬子江流域将为中国革命必争之

地，而四川位居上游，更应及早图之。”总部就是根据这个指示把在四川发难的责任交给我们的。

那时，四川留日学生有好几百人，加入同盟会的也有百数十人。归国后，大都分散在省城和各县城任职，他们在地方上都有一定的声望、地位和影响。我到重庆首先找到朱之洪、宋绍尊、张佐承、冉君毅、陈兴之。又到泸州会见谢奉琦、余英（在东京中山先生任他负责川滇黔边区会党的联络）。再到成都与黄树中等商定在成都草堂寺召开同志会议，到会三十余人，讨论起义问题。会上意见：有人认为我们手无寸铁，不能轻易冒险，作无谓的牺牲，主张等待时机，稳健从事；但大多数人则认为革命就要冒险，就要流血，失败了也可以造声势扩大影响，后死的还可以继续奋斗，故主张积极准备，准备好了就动手。于是议分工负责，分头进行。第一步就是抓组织工作，抓好核心骨干。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下手：

（一） 学界

同盟会会员和留日学生回川后任学堂监督（校长）和教习的甚多，而学生中大多富有爱国思想，易于接受革命的青年，故容易着手发展。同时，因八国联军之役后，清廷政府在学堂中推行军事体操，有些学堂还领到了一些枪枝，更为我们所注意。故推选黄树中、张培爵、黄金鳌、谢持、曾冠等负责策划学界方面的组织工作。

（二） 军队

当时川省为创办新军，曾设立武备学堂，训练军官，我们推选学生队员中的龙光、黄成章、王子均同志负责联系。

另外还有一个弁目队训练班长级干部。一九〇六年弁目队招考中规定只招收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还限制只招川北人，因为清吏认为川北人老实可靠。我们就有意识地发动了一批青年学生去投考，并推选学员中的同志秦炳、饶国梁（秦、饶两同志系

黄花岗烈士)、伍安全、易中、程德藩、但坚、朱燾等负责联络。这样，同盟会在新军基干中，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三) 会党(哥老会内发展的组织)

四川帮会的势力很大，分布的地区也很广，这是我们当时必须争取的社会力量。推选余英、曾省斋、黎清瀛、余切等负责。我们主要抓四个部分：

(1) 在重庆、泸州、叙府一带是余英的势力范围，余是一个富有民族思想的汉子，他常在菜堂酒店公开宣读《警世钟》、《革命军》一类书刊，自从他在东京会见中山先生并付予重任之后，更为积极活跃地奔走革命。这是同盟会可以直接指挥和运用的一支力量。本来哥老会内分仁、义、礼、智、信五堂，其中以仁字辈最大。余自日本回川后，倡导“仁、义”不分上下，另创了“义会”，并担任首领，因此声势日大。

(2) 以刘天成为首的刘西成、刘子成、刘炳云一帮，控制着云、贵、川边境一带地区，会众甚多，且有五子枪数十只，为当时最有势力的一部分。

(3) 以王松廷、毛长发为首的帮会控制着府河、铜河、雅河一带。

(4) 以向大鼻子为首的帮会控制着下川东一带。

此外，巡防军和警察中帮会弟兄也不少，仍由余英等负责联络。

初步规划议定后，我即到川东、川南各主要城市去活动——联系同志、了解情况、设立机关、发展党员、落实负责人员等组织工作。我先后去过成都、重庆、泸州、叙府、屏山、井研、永宁、永川等府县。当时我化名邱济川。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和发展组织，同盟会在各地吸收了大批有声望的爱国人士，重要的积极分子有：泸州的席成元（盐商，负责筹措起义的经费），邓邦植（宦宦世家，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就设在他家里，掩护党人

的活动)和黄宗干、罗绍图。叙府刘永年,屏山杨世尊、徐岱宗,荣县的黎靖瀛、邹固元、王天杰、赖君奇,井研的吴嘉读、鄢奉先、税钟麟、陈绍白,永宁的马图,永川的皮相全、黄宅安,巴县的朱之洪、冉君谷、陈兴之,富顺的邹丰三、曹笃、罗醒予,荣昌的胡树文、但懋庚、杨亚东、杨群玖,忠州的吴思鸿、江晓岑、江晓岚,涪陵的高亚衡,长寿的廖子业、涂海珊,大竹的陈风石、肖静轩,广安的张观风、王巨源、蔡体平、陈云九、吴梦耕,隆昌的黄万里、郑辉武、曾省斋等。以上这些同志都积极参与了起义的规划和策动,至今思之,还能追忆起当年在十分秘密、十分紧张的形势下,大家同仇敌忾、意气风发的盛况,下面将缕述历次起义的经过。

三、丁未年(公元1907年)各次起义的经过

(一) 江安、泸州之役

丁未江安、泸州之役是同盟会在四川领导和发动的首次起义。当时选择泸州为首先发难的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我分析当时的形势,提出了下面的几点理由:

(1) 泸州为川南重镇,上可进窥嘉(定)、叙(府),下可虎视重庆,泸州得手,即可震动全川,造成革命大好形势。

(2) 泸州系水陆码头,交通便利,且又接近云南边境,进可攻,退可守,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

(3) 泸州及附近各县党人最多,容易集中,领导力量相当雄厚。

(4) 泸州为余英家乡,帮会势力强大。

(5) 驻泸州的盐务巡防营和川南道巡防营,已与会党通气,可以策动内应。

(6) 军事用费可以通过席成元同志大力筹垫。

有了以上这些有利条件,大家也很有信心,认为可以旗开得

胜，马到成功。

当年搞武装起义最感困难的是没有自己的军队和足够的武器，作为起义的主力。清军虽然腐败，当时已有单发的毛瑟枪，比刀矛还是要厉害些，所以运动清军起义是我们发难的一课题。驻泸州的巡防营中虽有帮会弟兄，但同盟会员还没有打进去作统率干部，不易得手；而江安巡防营中则有同盟会的同志刘安邦、鲍九成当哨官，因此我们制定实施计划是：

(1) 刘安邦、鲍九成先期在江安做好准备，届时顺流而下攻打泸州，由程德藩、赵铁桥协助。

(2) 由余英召集会党三千人，散布于泸州城内外，举火为号，党人和会党分三路进攻道台、知州、都司三衙门，另一路打破城门，迎接刘、鲍部队与城外会党和联系好的当地巡防营，做到里应外合。这里由党内同志谢奉琦、邓邦植、席成元、杨兆蓉、黄家干、罗肇图等负责组织。

(3) 由余英邀约刘天成带领帮会弟兄作为外援。

(4) 通知成都、叙府及时响应。

(5) 我从东京带回五个炸弹作为实样，立即仿制。我和黄树中配制炸药，税钟麟制弹壳，赶制了一批炸弹送江安、泸州备用。我的任务主要是往来各地接洽会商，作出决策。根据当时双方力量的对比是可以一举攻克泸州的，因而又忙着计划占领泸州后，即着手组织军政府，建立四川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最初泸州同志计议在端午节起事，因为当地素有赛龙舟的风俗，届时远近人民来看热闹的常是人山人海，利用这个机会在域内外集合几千人，可以避免清吏怀疑，行动比较方便，不失为一个起义的好机会。但成都方面不赞同，以时间太迫，准备不及，主张改在十月初九清吏庆贺西太后寿辰那天举义，使清吏措手不及。这一建议泸州方面决定同意了。

不幸的是在准备期间接连发生了几件意外事故，对江安——

泸州起义失败有很大的影响。第一件事是我们在永宁兴隆场制造炸药时，黄树中在制造过程中发生爆炸，受了重伤，去重庆医治。此后他就改名黄复生。事后永宁县衙门追查炸弹案，因有杨庶堪、朱之洪、马图等来函相告，我同黄方、杨维才及时出逃，迁去犍为县铁山税尊三同志的铁厂，继续制造炸弹的工作。关于永宁炸弹案的有些资料说我也受伤的说法不实，因为出事时，我恰巧同黄方同志和黄建勋（兴隆场会帮舵把子）一起去郭家坟（靠四川边境的云南小镇）长官司找当地绿林头目殷吉祥，希望他出力相助或借用一些五子枪，所以幸免受伤。

第二件事是会党弟兄虽然乔装成各种各样的小商贩赶来集合，但泸州突然增加了几千人，城内外大小客棧都挤满了，他们说话随便，行动也不甚检点，民间也传出种种谣言，清吏自然要加紧防范。

第三件事是由于谣言多，风声大，泸州知州杨兆龙想出了擒贼先擒王的狡计，先在衙内布置好持械堂勇，然后邀余英进去议事，阴谋捕杀他，但杨兆龙见到余英单人独马而来，神态自若，反而犹豫不决，不敢下手。要余稍待，退与幕僚商量。幕僚官吏中有些人认为余英敢单刀赴会，必是心中坦然，不会有事；有的又认为余是龙头大爷，即使有图谋，也是早有准备，而且差役堂勇多半都是他的徒弟，轻率从事，怕出乱子；还有人认为万一风声不实，扣留余英，闹出乱子，反而不好向上交待。这时候，堂勇耳语余英：“大爷，水涨了！”余即乘机走出。后来杨兆龙见事已败露，即下令缉捕，形势又更紧张了。加之帮会弟兄缺乏组织纪律，各小头目约束不了，恐日久生变，于是匆匆商决提前于十月初一发难，并密电成都同时响应。

原来决定初一日半夜由江安县署刑吏戴波举火为号，城外同志和帮会兄弟即起而发难，刘安邦、鲍九成则乘机率领所部直攻泸州。不料，县令事先已得密告，当火起时，一面扑火，一面即